

# 回忆 1952 年的清华大学毕业分配教育

○ 夏武祥（1952 届航空）



夏武祥学长与夫人

1952年，我从清华航空系毕业。那一年是很有特点的一年。从国家层面讲，第二年1953年，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年，国家正在大力调配大批参加建设的干部、工人和技术人员。考虑到技术人员的缺口，中央决定全国大学理工科三、四年级学生同时毕业。从清华层面讲，这一年是清华作为设有文、法、理、工四个学院的综合大学的最后一年，下一年就改为只有工科的大学。因此，这一年清华毕业的学生人数之多，在历史上是空前的。

这一年，无论国家还是学校，对毕业教育都给予了很大重视。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，是邀请多方面负责人向同学作报告，讲形势，介绍国家现状，引导同学深刻理解个人与国家的关系，使同学能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建设高潮。我参加了当时的毕业教育，作了详细记录，全部约14000字。主要内容如下：

第一讲：革命青年人生观（报告人蒋南翔，时任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，后为清华校长，教育部长）。主要内容包括：确立为人民服务的志向，对“学以致用”的认识，认识人民教师的重要，革命的乐观主义等。在讨论中，他希望毕业同学弄清如何实践为人民服务，如何理解学以致用，将以什么样的革命热情迎接祖国赋予的任务等。

第二讲：新中国的经济建设（报告人薛暮桥，著名经济学家，后为国家计委、经委副主任）。主要内容是：三年来新中国生产的恢复和发展，中国经济的改造，今后的经济建设等。在讨论中，他希望毕业同学弄清新中国经济的恢复、改造、发展的基本原因；经济恢复、改造、发展对今后大规模建设的作用；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优越性；在大规模建设中我们的任务；祖国光明前途与我们个人前途的一致性。

第三讲：目前形势（报告人范长江，著名新闻工作者，后为人民日报社长）。他讲话伊始就指出“大家在校期间是我们国家恢复改造之时，今天则是面临着一面抗美援朝一面计划经济开始”。同学们已经准备为人民服务，进入到担负国家一定任务，掌握国家一定权力的时期，这是个重大问题重大的转变。认识一下各种有关工作和形势是完全必要的。

第四讲：东北工业建设（报告人袁葆

华，时为东北工业部计划部负责人，后为国家经委主任）。内容包括东北工业特点和三年来恢复的情况；东北作为工业基地的情况。报告人从资源、设备、干部、资金方面做了分析，讲述了几年来东北工业管理、建设的成就和几点经验。

第五讲：对同学提出要求（报告人安子文，时任人事部部长，后为中央组织部部长）。他提出，什么地方需要就去什么地方，什么工作需要就做什么工作。为了大力展开建设，党和国家不得不向同学提出较高的要求：站稳革命立场，划清敌我界线；具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；精通业务。

第六讲的报告人是钱俊瑞，当时是高等教育委员会负责人。主要内容包括新中国的教育和发展；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，响应祖国的召唤；到工作岗位应注意的问题：首先明确自己所担负工作的性质和所起的作用；不断地学习，不要满足学校所学的；团结：团结上、平、下级，首先是团结工农同志。

通过以上学习，同学们干劲更足了，填写工作志愿第一条是“服从国家需要”的相当普遍。

再说说我自己。同学中，我是半途离开航空工业的，也是一生中工作变动较多的。60余年的工作生涯中，在每个岗位上，清华的通才教育和校风学风都深深影响了我。可以说，这些年无论做什么，无论顺境逆境，清华对我的教育、鼓励、支持和鞭策是无时无刻、有形无形地存在着。

我们这个年级是新中国成立前进入清华的最后一个年级，毕业又在院系调整之前，可以说是经历了老清华向新清华剧烈

转变的时代。既带有许多老清华的色彩，又开始了新清华的萌生，算是新旧兼备的一个特殊时段吧！

1952年9月3日，我到航空发动机工厂报到，在工厂接触到了实际应用。除了对发机构造和使用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外，还学到了在学校接触很少的锻铸、热处理、机加工工艺等实操知识。由于有了清华通才教育基础，我通过自学和工作实践扩大了知识面。在这个厂工作的13年里，我从小型、中型活塞式发动机干起，干到喷气式、涡轮螺旋桨式发动机，导弹；还干过摩托车发动机、汽车发动机等大量民品，使自己对机械工业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。

1965年，我奉调到北京第三机械工业部。到部里工作参观了不少中央企业和地方工厂，还参加了一些选厂址的工作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，我被下放到干校劳动。1970年，调我到大型直升机、运输机基地参加基地筹建。很可惜的是，刚开始建厂，就遭遇了国家经济困难，只得停工。至今想来，在我生命中最好的年华没能干成什么事，只觉无限惋惜！

后来部里科技局要借调我去协助工作，我也很愿意，于是干起了“临时工”。这期间我主要做了“航机陆用”，即将航空发动机改型为工业用燃气轮机的开发工作。当时“文革”尚未结束，部里的干部政策是：下放的都不能回来，不搞原班人马。总这么吊着，我也不愿意，于是自找门路，就随着“航机陆用”任务，调入了总成套的北京重型电机厂，从此离开了航空系统。回想起来，此事于工作和我本人都是有损有益，但也是大形势大环境所左右，我也不后悔。

## □ 母校纪事

1982年，我被调到国家最高经济机关：国家计划委员会。80年代初正值能源紧张，计委就成立了节能局。我被调入节能局，负责节能科研开发。计委业务面涉及各行各业，节能又与各行各业都有关系。我这个习惯于在工厂工作的人，犹如从“坐井观天”到“包罗万象”。最大的感觉就是，知识面严重不足，要尽快学习许多领域的知识。这期间国家实行开放的方针，计委又是经济领导机关，与国外开始了较多交往，52岁的我也为引进双费率节能电表有了第一次出国的机会。

计委是管国家宏观经济，主要任务是制定规划制定政策，这对长期在基层工作的技术人员我来说，要有很大的“转变”才行。应当承认，我这个“转变”完成得很差，可以说在计委的5年，自己没真正进入角色，当然也没有做好计委干部应做好的宏观经济工作。回想起来真是“捡了芝麻丢了西瓜”，不够称职。好的一面是扩展了知识，使我对能源、能源效率、可再生能源以及环境保护等有了认识体会，这又得感谢清华通才教育打下的坚实基础。

80年代中期，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，节能局的部分工作划入了公司（开始叫中国工程技术开发公司，后改为华能公司）。该公司后来定位为只搞发电，停止一切非电项目，节能技术开发工作也就逐步消失了。这期间我到英国和德国去了半年多，也是我一一生中唯一一次在国外较久的生活，经济来源是英国能源经济学会和德国洪堡奖学金资助。按华能规定，副局级干部可工作到63岁，我遂于1995年6月退休。

至今我退休已23年，但实际我是退而

未休，基本没有停止过工作。主要从事那些不坐班的、我感兴趣的、有利于国家引进资金和技术及能出口产品的项目的咨询、代理、顾问和翻译等事项。由于许多项目从未接触过，就得边学边干，跑国家图书馆成了必不可少的活动，几乎每周都去。每遇到一个新的、过去不熟悉的题目，就去图书馆。先看教材书籍，了解其原理；再看国内行业杂志了解国内水平和有关哪些单位；再查外文资料看国际上处于何等水平、有何可借鉴之处。这三步走过后，大致可形成工作思路或计划，也知道该找谁合作联系了。

二十余年来，事情干得很杂，主要围绕节能、环保、新能源、气候变化等方面。例如：与德国VKR公司和国内煤炭部平顶山煤矿合作开发煤矸石发电厂；与美国POWER BRIDGE公司和松藻煤矿合作，开发煤层气发电厂；协助德国BISCHOFF公司开发电厂脱硫项目；协助瑞典LGP公司开发移动通讯塔顶放大器的项目；与瑞典ISS公司合作，出口清华核研院研制的集装箱检测系统等。这么多项目，有成功的，但多数是部分成功，甚至是不成功的，但我认为它们都是符合时代需要和技术发展的。因为只要方向对，迟早会起些作用，至于在我有生之年能取得什么成果我并不介意，也不后悔为此付出的精力。只要身体还行，我仍准备这样继续走下去。蒋南翔校长提出过“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，这一要求我早已超过。我觉得于国有利，于世界有利，自己有兴趣，能起点作用就很满足了。

简单回顾一生，我写了四句话：

绕膝弱冠烽火逢，而立前后醉航空。

天命始知能源少，耄耋倍感环保重。